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 集体记忆的整合逻辑<sup>〔\*〕</sup>

张淑娟<sup>1,2</sup>, 王 硕<sup>1</sup>

(1.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2. 北方民族大学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一个铭记和演绎民族情感、民族信仰和民族历史的集体性意识,铸牢工作则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现与重构,自然赋有整合集体记忆的深深刻意,对集体记忆具有保持、传承和建构的整合功能。整合集体记忆具有清晰的脉络,在整合之前,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在的“记忆之场”、互嵌的文明意义、共塑的民族精神,深刻体现了两者的高度契合性,为整合提供可能;在整合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集体记忆进行双向刻写,追溯并厚植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将整合变为现实;在整合之后,集体记忆本身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和支撑,具有强化和维系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归属感、民族认同感和心灵共鸣感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筑牢记忆框架、规正记忆方向、丰富记忆载体,进而完成整合续写。

〔关键词〕集体记忆;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2.0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sup>〔1〕</sup>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

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sup>〔2〕</sup>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定位不断清晰,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纳入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之中并反复强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精品力作。<sup>〔3〕</sup>习近平在谈及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时,多次追溯中华民族元素,如

作者简介:张淑娟,民族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王硕,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的阶段性成果。

共同的故事、回忆、历史、文化等,将“记忆”照进现实,这种叙事实质上是对集体记忆的认可与唤醒,将各民族成员“引情”至共同的过往经历,以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需要此类兼具集体性和聚合性的情感力量,使中华民族走向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因此,学者们也注意到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sup>[4]</sup>本研究主要将集体记忆作为解释框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下对整合<sup>[5]</sup>集体记忆的“前、中、后”过程进行全景扫描,从而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整合集体记忆时的互动关系和表征,有助于借力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实现记忆的续写与传承。

## 一、作为解释框架的集体记忆

### (一)集体记忆的内涵及特征

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复合型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涂尔干的“集体欢腾”,<sup>[6]</sup>而对这一概念实现“克服”和超越的,正是在“集体记忆”领域拥有肇始之功的莫里斯·哈布瓦赫。基于“过程论”视角,他将集体记忆视为一种“重构”过程,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sup>[7]</sup>基于“二分法”视角,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辨析关系之中,集体记忆的重构并不是个体主义意识的建构,虽然“拥有”和“生产”记忆的是个人,但始终受到社会集体框架的影响,并经由集体成员构成的共同体而存续,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因为“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sup>[8]</sup>虽然群体或机构不能“拥有”记忆,但植根在特定群体和机构的个体,也只能依靠这个特定群体的情境去追忆和再现过去,因为无论何时我们生活的群体都能提供给我们重建记忆的方法。<sup>[9]</sup>推论之:个体记忆寓于集体记忆之中,集体记忆通过个体记忆体现自身。除此之外,还有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二分法”,皮埃尔·诺拉指出:“前者是流动的、变形的,并且会将一个社会群体

的传统包裹起来。后者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是专门的科学方法受到应用的结果。”<sup>[10]</sup>由此可以看出,集体记忆不等同于历史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完成了对历史情境的超越,内化为一个族群的包括情感、意志、信仰等在内的聚合性意识,或是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精神标识。集体记忆是从群体的“内部”反视群体,力图描绘出集体成员的共同意识,以便在各个阶段都能获得身份确认和集体认同,自然会隐去部分深刻的变化,而在“历史”中“只有那些体现变化的过程或事件才算得上史实”。<sup>[11]</sup>同时,集体记忆基于不同时代的语境不断重构,通过集体的考量、现实的取舍、历史的参照得以形成,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对历史情境的原样复现。因此,集体记忆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观念、意志和期待。

在讨论集体记忆的概念时,功能主义范式的研究更加注重价值属性。王明珂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造成人群凝聚的‘亲亲性’都有赖集体记忆来维持。”<sup>[12]</sup>一个族群的凝聚和变迁,需要以共同的仪式不断强化集体记忆,或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加以维持,当置于移民情境之中时,族群的认同和凝聚也同样遵循这些法则,需要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进行寻根,去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新族群认同。麻国庆将当代中国集体记忆定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sup>[13]</sup>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及其贸易、文化、历史、习俗、信仰之间的碰撞和叠加,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提供了丰厚素材,形成了“区域”的集体记忆,各民族集体记忆经由交融互动,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总之,集体记忆作为文化和心理的记录,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过往的记忆,是引起群体性情感共鸣的标志要素。集体记忆能够跨过个体的边界融入集体领域,进而支持了群体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相关的集体性情感认同。

集体记忆生成于社会集体框架之中,又以内聚性情感连通“过去—当下—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被贮存、沉淀和升华,必然带有记忆的独有性、社会性、时空关联性、可重构性等特征。集体记忆的独有性,是指每个社会群体拥有独属的集体记忆,这一特性在“移民”情境中尤为凸显,当某一个体移民至新的国家或族群时,所融入的新环境提供了“失忆”的温床,因为新进成员与原生成员即使建立了友谊或至少是联系,但在实际交流中仍会存在情感的绝缘。这种“障碍”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缺乏充分共享的集体记忆,即使对方提及亲历过的“欢腾时刻”,但因不曾拥有共同的历史参照和弥合基础,所以被排除在彼此的集体记忆之外,由此造成了轻度疏远。集体记忆的社会性,是指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构成了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在框架内“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sup>[14]</sup> 一是因为只有置于社会中,人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sup>[15]</sup> 二是“只要支持它的社会一直存在,集体记忆也就会获得滋养、不断推陈出新,得以强化和丰富,而不会丧失它逼真的色彩”。<sup>[16]</sup> 集体记忆的时空关联性,是指集体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具体的,记忆的强化和再现需要在空间上被物质化得以表征,在时间上被现实化获得定位,需要在具体时空中促发特定节点来唤醒人们的情感、回忆和印象。一是以空间为轴,各种客观实体、地理空间将集体记忆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使集体记忆趋于具象化,如纪念馆、博物馆等社会功能场所;二是以时间为轴,在各种重大事件、重要节日中反映集体的“被经历的时间”,使集体记忆获得定位和坐标。集体记忆的可重构性,是指集体记忆的唤醒和再现是一种重构过程,因为群体中的回忆很难被完全保留,仅是片段式地被提及,无法再现出一整套的特征、迹象、描述、命题和反思。换言之,需要唤醒或回忆的事件在时间跨度上越是遥远,越有可能对其保存的意象进行润色粉饰,加以重构和修补。

## (二)集体记忆的功能及形式

集体记忆是各群体成员铭刻生活烙印的集体性意识,能够唤醒和增强群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以实现群体的稳定和完整,作为功能化记忆,集体记忆建构了我们的共同体意识。

第一,集体记忆具有认同功能。集体记忆是构成集体认同的基础,认同作为一种情感依附和身份确认,本身就带有独特性,并使某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在历史演进中堆叠起来的,这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征,借助诸多符号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集体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并不断沉淀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源泉。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是因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文明中、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演进道路中得到确证和强化,成为中华民族成员更为广泛的“过去”,为人们提供心灵归属和情感寄托,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提供方向指引。

第二,集体记忆具有团结功能。集体记忆是在实现人们的意愿和经受时代的历练之中,能够引发特定历史阶段群体共鸣的内聚性意识,而群体的“意愿”和时代的“历练”,可以理解为拥有共同的远景目标,或者面临共同的民族阵痛。在此情景下,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集体记忆的动员和凝聚功能得到充分释放。类似于“中华民族”话语被强调的情境,<sup>[17]</sup> 这些情境都成为中华儿女进一步回忆过去、憧憬未来的历史参照和基石,使得中华民族成员对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想象更加清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密度和民族性“浓度”得到提升。

集体记忆涵盖一个群体对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全部认知和想象,包括思想的、情感的、物质的、实践的等多种形态,其具体形式必然呈现出内化和外化的多重性,可表现为符号形式的意识观念、物质形式的客观实在和文化形式的实践活动等。集体记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意志和情感形态的集体记

忆,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者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当代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肌体”;二是作为实物和实践形态的集体记忆,凝缩在赋有民族情结和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中,并在仪式操演中获得周期性强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 二、整合的可能: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性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依存、彼此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集体记忆具有整合作用,并具有清晰的整合时序和脉络,在“整合”之前,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在的“记忆之场”、互嵌的文明意义、共塑的民族精神,深刻体现了两者的高度契合性,为整合提供可能。

(一)同源共生:同在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记忆之场”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首先体现为同源共生性,即同在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记忆之场”——中华大地。任何集团如果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就必须想方设法寻找一个“地点”,并加以保护,不仅能够为集体成员提供交融互动的场所,而且能够成为他们身份与认同的象征,这都源于“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sup>[18]</sup>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也是如此,其生存繁衍也需要明确且稳定的空间范围,<sup>[19]</sup>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大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中华大地为中华民族生成集体记忆和建构民族意识提供了全部地理要件。作为中华民族家园的中华大地,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虽有扩大和缩小,但都是“基本完整地将帝国时代的国家版图转换为现代中国的疆域”,<sup>[20]</sup>中华大地所独有的地理单元,可供中华民族在整全的领土、连续的文脉之中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演绎出中华民族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因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所涵盖的“过去回忆”“当下

经历”和“未来想象”绝非凭空出现,都是生成于中华儿女长期的生活互动与实践,以及历朝历代统治者对领土整全所付出的政治努力,“使特定祖先的领土与人们的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实现集体‘记忆领土化’,进而形成祖国观念”,<sup>[21]</sup>为集体记忆的强化和形成“国家”内聚性情感作出铺垫。同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如此,作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中华大地,成为中华民族进行集体想象、生成集体记忆的唯一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安身立命的生态场域。

第二,在中华大地的“位置系统”中所衍生出的疆域意识,不断为中华民族走向一体提供基础和养料,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的疆域意识萌生于中国先贤的“天下”想象,其核心追求并不仅限于空间意义上的疆域界限,还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和内聚意识。起初这种构想是“模糊无限”的,直到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的疆域意识才逐步清晰并趋向“有疆有界”。疆域版图的底定和疆域意识的强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努力和共同想象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不断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成为中华大地的“场之记忆”。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sup>[22]</sup>在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凝聚为牢不可破的民族实体,今日之中国版图,是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创造的历史遗产,既凝缩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包括领土认同、民族一体感、“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区分等在内的心理倾向,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想象的地理符号,而诸多地理符号成为唤醒集体记忆、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资源。例如,中华大地曾以“秋海棠叶”“东方雄鸡”获得形象化表征和描述,作为中华民族成员对领土认同和疆域意识的原初性认知,经由不断传播演变为中华儿女所熟知和认同的具象,成为民众内心深处的记忆符号,中华大地就此被当作“故乡”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扎根,中华民族的领土意识、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

(二)内容互嵌:皆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沉淀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容上具有互嵌性,皆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沉淀,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民族文明根脉的共同追求与传递。唤醒集体记忆,实质上就是推动中华文明在当代实现文化沉淀和意义固定的过程。中华儿女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并不是过往事件、实践活动、人物经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中华民族成员个体记忆的机械填充,而是作为一种兼具历史与文化的心理复合体,需要借助中华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获得援引和支撑,自然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根脉和文化基因。“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sup>[23]</sup>而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sup>[24]</sup>作为中华民族最为深沉、最具特性的文化符码和同脉印记,早已扎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成为最持久、最自信的集体记忆,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行为习惯。唤醒集体记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中华文明的当代赓续和意义固定,特别是对那些可能消失或极易消失的中华文明进行保存和创新,有助于唤起群体性的文化认同,并促使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在每一次文明传承中获得复刻和强化。

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拥有深厚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基座,因为文化本身就是某一民族民族性的重要体现,特别是通过过滤、沉淀和凝聚而形成的文化认同,成为各民族成员情感交融的关键纽带。中华文明具有许多价值元素,如“中国”认同的确定、“大一统”理念提供的基本政治遵循、“天下观”赋予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和合”思想蕴含的和谐包容特质等,共同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离开这些价值元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被虚置、掏空,被抽离成没有文化根脉和文明活水的“躯壳”,各民族成员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内聚性情感链条也将被撕裂,中华儿女共同的集体记忆也会随之消散。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作为重要援引资源的中华文明,特别是其所彰显的

“五个突出特性”,<sup>[25]</sup>既从历史根基、内生动力、价值追求、和谐共生和世界价值等五个方面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是中华民族在文明意义上最鲜明的记忆标识,塑造了中华儿女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意识。中华文明从五个方面实现其特性的凸显,究其原因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并承载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横平竖直的汉字、孔孟老庄的思想、经史子集的典范……无不闪现着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历史轨迹和文化记忆,因为独有,所以不可复制,所以造就了独特品格的民族和自成体系的文明。

(三)价值同向:共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维度上同向同行,共同形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生发于对民族“过往”的眷恋,落脚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在中华儿女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获得强化,并对作为记忆主体的中华儿女,时刻发挥着精神塑造和引领的能动作用,以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认知的内聚性情感,拥有深厚的历史纵深,并历经长期的淬炼升华,渐次生成了三重意涵,<sup>[26]</sup>同时又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之主线、民族工作之“纲”,始终强调整体性和共同性,不断形塑着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意识、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价值功用的视角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吻合和交叉,共同规范和凝聚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共识和行为选择。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对特定“过往”和未来想象的情感共鸣,以形成群体性、内聚性意识为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以中华民族本体为核心的“五个认同”<sup>[27]</sup>为目标,强调的是身份意识和边界意识,引导中华民族成员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形塑团结内聚、命运与共的民族精神,确保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诞生于中华儿女的共

同生活并渗透其中,同时又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对共同体成员展开理性规约。如同家庭祖训、礼仪习俗、宗教传统一样,既是一系列关于过去的个体意象的集合,又是运用于育化的范例、模式和要素,再现这个家庭历史的同时,更确定了家庭成员的特征、品性。这些习俗或模式一视同仁地赋予家庭成员某种观念和情感,以此设定一个框架规约家庭成员的行为举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框架传统上就是家庭的保护层”。<sup>[28]</sup>于中华民族这个特殊的“大家庭”而言,这种“框架逻辑”依然成立,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庭成员”,也作为集体记忆的“在场者”和“亲历者”,集体记忆源于他们的共同生活,又以各种习俗、礼仪、道德、宗教等形式渗透至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他们的行为。

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行为规范的导向作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摄下,中华民族成员更加自觉地从内聚性的维度再构中华民族的聚合力、向心力,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目标一致的行为自觉。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华民族成员能够自觉地对其自身进行理性规约,汇聚起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团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的广泛传布,进而感召人民大众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最好的例证。<sup>[29]</sup>在新时代,那种“苦难中铸就辉煌”的过往已成为中华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而“奋斗后赢得未来”的前景又成为记忆的续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极具号召力和向心力,再度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格局和态势更加稳固。概言之,遭受“集体苦难”的过往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创造“集体辉煌”的追求成为传统集体记忆的动力,两个维度都伴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与凝聚,同时,在此过程中集体记忆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并进”,共同形塑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为衍生出命运与共的

族际关系和共同体心理作出双向努力。

### 三、整合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集体记忆的双向刻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整合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不断地对集体记忆进行双向刻写:一是追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二是厚植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将整合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再现和重塑的过程。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集体记忆的整合提供历史契机

整合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之主线、民族工作之“纲”,这种历史性的工作瞄定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要从“凝聚一体”向“牢不可破”前进一步,也需要追忆过往,因为“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sup>[30]</sup>对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进行选择、整理和建构,需要在最广阔的层面影响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生活,甚至在具有颠覆意义的层面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整合集体记忆提供了历史契机,主要是为整合集体记忆定设了标靶,并从根本上决定了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整合集体记忆,并非由追忆者在历史长河中任意驰骋,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照下进行集体记忆的整合,需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sup>[31]</sup>共同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最大公约数”,是塑造共同性的重要抓手,一是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边界与认同,二是铸就了共同体的根源,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认同,就此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定设的追忆标靶。

同时,整合集体记忆并不是对过往进行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对其作出的刻意选择和过滤,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决定了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有着清晰的流程分界:第一步“唤起”,引导各民族成员围绕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历史过往进行系统回溯；第二步“重构”，部分记忆无法摆脱“忘却”的束缚，导致了集体记忆的残缺性，整合集体记忆要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强烈的当下思考，必然要对残缺记忆进行修补和重塑，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构最具影响力的集体记忆；第三步“固化”，通过各种途径使新记忆富有认同感和合法性；第四步“续写”，使集体记忆实现沉淀、保持和传承，需要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进行展演，强化各民族对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加深共同体的凝聚，使集体记忆呈现的最终面貌能够表达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愿。

## （二）追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虽然记忆、回忆不能等同于历史，但记忆本身就刻有历史的印痕。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其安身立命之基，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sup>[32]</sup>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历史，具体指涉中华民族暂时的民族阵痛和持久的伟大荣光，这都是各民族共同经历、共同见证的历史，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展演出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自然留存了中华民族印象深刻的历史“镜头”，成为中华儿女内心中诸多经验、情感和信仰的复合型“历史快照”。特别是重大时刻、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坐标性记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扎根筑实，构成了中华民族成员之间极易被唤醒的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对历史的叙事和反思，因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历经千年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实体，与之相伴而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拥有深厚的历史纵深，是在长时段历史基因浸润下的内聚性情感。因此，回溯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合集体记忆的重要抓手，基本形成了“从后思索”<sup>[33]</sup>的两条脉络。

第一，对中华民族的暂时阵痛进行回溯，追忆中华民族共御外侮、团结统一的抗争历史，再度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帝国主义这个强势

“他者”正面接触之时，主权遭到了严重威胁和践踏，自此陷入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战乱频仍、列强环伺的苦难与动荡中，特别是日本全面侵华，在中华大地犯下的罪行、制造的悲剧，成为中华民族无法忘却的悲痛历史和集体记忆。由此，中华儿女的共同体意识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敌我边界意识愈发清晰，斗争目标由“反帝”收缩集中至“抗日”，最终凝结为统一整体，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形成。可以说，中华民族暂时阵痛的集体记忆，将原本嵌在中华民族基因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充分激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正是在艰难困苦中获得唤醒、强化和升华。因此，阶段性的苦难记忆被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要素得到保存和延续。正如我们设立纪念日、纪念馆、纪念碑，以及在重大节日举行包括文本纪念、会议纪念、艺术纪念等在内的纪念活动，将顽强抗争、为国献身、生死相依的民族精神深嵌其中并充分释放，借助仪式展演来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沉痛记忆，产生知耻而后“聚”的情感效应，再次将中华民族凝聚成拥有血脉记忆的共同体，实现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强化。

第二，对中华民族的持久荣光进行回溯，追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辉煌历史，再度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和奋进合力。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不断创造奇迹的历史，诸多人类文明成果始于中国并传向世界，铸就了中华民族最为自信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史上的“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sup>[34]</sup>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史记，增加了中华儿女集体记忆的深厚底蕴。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服务型政党，百余年的辉煌党史，也自然凝缩了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谱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去追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开创的历史伟业，在整合集体记忆的同时，强化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自信

心和凝聚力。例如,从新年贺词到历届党代会,开篇即回顾过去一年、五年甚至十年中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美好生活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对“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华儿女”的统括、对“团结奋斗”的刻画、对“历史性胜利”的总结,足以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不等于个体记忆,而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诸多重要场合、重要会议、重要节日去总结和回顾中华民族的持久荣光,能够在集体成员脑海中复现全民族共同拼搏的场景和共同缔造的辉煌,将其引情至共有的“欢腾时刻”,与个体记忆产生高度的情感联通和共鸣,进一步实现对中华民族特定时段集体记忆的整合,以强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情感。

### (三)厚植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根脉所系。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化促使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缔造了共同坚守、共同传承的文明成果,助推中华民族内聚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共同体。在中华文明的濡染之下,中华民族创造了集各民族之大成的灿烂文化,从玉石、陶器、丝绸等文化精品到石刻名窟、运河沟渠、帝都宫殿等宏伟建筑,从饮食、宗教、礼仪等生活习俗到汉字诗词、书法国画、舞蹈音乐等文学艺术,都作为符号象征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而深沉的民族形象及其当代气韵,正是在对这些文化符码的追寻、存贮和拣选中被铸成的,并经由中华儿女在长时段记忆系统中回忆、想象,才最终成为共识的集体记忆,也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脉。

第一,追溯先贤文化之根实现集体记忆的整合。从“古代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多元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波浪式前进”中走向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拥有不断承继的文化根脉。“大一统”思想的安定之道、“和合”理念的包容胸怀、“天下观”的治世视野等中国先贤的思想文化,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与历史走向,孕生了仁者爱人、讲信修

睦、和谐共生、天下和合的民族情感和人间道义,形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进而凝结成共同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文化表达越是深远厚重,对中华儿女的精神塑造性越强,集体记忆则更加深刻和强烈,因为“古代表征越古老,它们也就越强大;采纳他们的人数越繁多,群体越广泛,这些表征就会变得越强劲有力”。<sup>[35]</sup>换言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持久记忆,一是其本身古老而深沉,作为人类文明中唯一一条未曾中断的文明根脉,中华文化依靠其文明特性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互动,使自身“枝繁叶茂”,成为更加持久、更具标识的民族记忆;二是在与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情感观念相融通时,不断获得支持和强化,成为更加自信的民族记忆。先贤文化中以儒家文化较为典型,在历史上虽有过“遗忘”、有过争鸣,但更多是包容交流、吸纳互鉴。儒家文化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和风格,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践行,值得我们去回溯、追忆和传承。因此,“祭孔大典”不是一次简单的纪念仪式,而是在对文化根性的追寻中整合集体记忆,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心印记,升华为共同的集体记忆,借助“祭孔大典”的仪式操演再次将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融通在一起,在追寻中华民族共有的先贤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了集体记忆的整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第二,追溯始祖文化之根实现集体记忆的整合。始祖文化是顺应族群、部落、民族的凝聚和认同而生成的,流传着中华民族创世、造人、开物的神话记忆,既是“多民族同宗同源”的重要叙事,又自然蕴含“中华民族是一家”的真挚情感,成为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注脚。在始祖文化记忆的整合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

一是历史文献记载丰富。史前记忆中对“三皇五帝”的相关记载,以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和族群,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如《淮南子·原



道训》记载的创世神话、《庄子》记载的伏羲神话、《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的补天神话、《山海经·大荒经》记载的侖帝神话等文字文献,成为中华儿女追寻始祖文化的重要范本。即使在主观解读和传承过程中有所变化并存在着差异,但主体的核心叙事始终如一,经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多次整合、编纂,在中华儿女心中不断形成一脉相承的认同谱系,相同的身份归认不断沉淀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强化了中华民族血脉同源的民族意识。开展黄帝陵祭祀活动正是使中华儿女置身于神圣高远的意境之中,对黄帝的创世伟业进行追忆和缅怀,进而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实现对中华民族始祖记忆的整合。

二是口头传承<sup>[36]</sup>广泛而热烈。虽然口头传承的声音表达“出口即逝”,但内蕴的情感寄托依然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因此,口头传承的保持和延续必然要依靠集体记忆,塑造成共同记忆的文化单元。在少数民族生活之中诸多始祖文化的口头传承十分“活跃”,如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拉祜族的《创世纪》、黎族的《人类起源》、哈尼族的《厄朵朵》、<sup>[37]</sup>瑶族的《密洛陀》、水族的《古双歌》、藏族的《什巴开天辟地歌》等口头神话,都源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集体信仰,成为我们解读民族历史、整合集体记忆的密钥,实质上历经千年传唱的史诗文化,其形式及结果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建构。始祖文化的口头传承之所以在民间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成为普遍共识而被接受,在民俗中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实践意义,并逐渐融入社会生活、节日活动实现生活化,促生了在不同境遇下整合多重记忆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关乎族群身份的体认和根脉同源的追寻,在国家宏观历史叙事的加持下,进一步肯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以唤醒共同祖源、共同历史的根基性情感。

三是文物遗址的佐证与支撑。相关地质、器物、古人类、古生物等具有实证意义的文物遗址

的具体呈现,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何而来”“有何经历”“走向何处”的根本问题。如原始族群的古人化石和生活遗址,不断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但部分久远的文化记忆与当下场景具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以历史回溯、历史再现的方式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势必要对其重建,或借助现代具象化载体予以新的表达,突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sup>[38]</sup>我们对黄鹤楼、滕王阁、青龙寺、雷峰塔等史迹遗址的修复,是基于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的需求而进行的重建活动,通过人文与物、人文与地之间的互动实现集体记忆的整合。此外,再现历史记忆的文化节目频繁出圈,从《国宝档案》《国家宝藏》到《文物“潮”我看》,从《诗词大会》到《经典永流传》,从《故事里的中国》到《典籍里的中国》等情景化文艺节目,打造出沉浸式的空间体验,将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历史、绝世瑰宝立体化呈现,进一步建构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 四、整合的续写:以集体记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忆的缺席就意味着现实理解的破碎,没有集体记忆的深度整合就难以形成对现实的厚重认知。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面相而言,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整合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化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彼此契合,为整合提供可能,助推中华民族完成对集体记忆的双向刻写,使整合变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合的绝对完成。集体记忆本身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和支撑,具有强化和维系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归属感、民族认同感和心灵共鸣感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以筑牢记忆框架、规正记忆方向、丰富记忆载体“反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整合完成续

写,实现对集体记忆的全过程整合。

(一)筑牢记忆框架:在稳定结构中形塑身份归属感

集体记忆的框架可视为“同一社会中许多成员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sup>[39]</sup>集体成员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想象。就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言,其设定的框架关乎中华民族对自我身份的想象,具有根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作为一种工具,构筑集体记忆框架更重要的作用是形塑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促使全体成员自觉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具有强烈民族性、稳定性和时代性的记忆框架,以提升中华民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一,增强记忆框架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特征,站位于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的角度筑牢集体记忆的框架,需要重视挖掘集体记忆内蕴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将中华民族成员统摄至最为熟知的民族情境之中,运用最能代表和反映中华民族特性的记忆符号增强记忆框架的民族性。中华民族最具民族性浓度的“名片”,基本上是由未曾断裂的“国家”“国民”和“国土”构成的。这些历史成果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民族特性,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态和走向,成为重要的记忆符码融入中华儿女的内心里,能够引导他们在极具民族性“浓度”的记忆框架之中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进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如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民族自信等既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民族气节,同时这些情感也存在于其他民族国家的认同谱系之中,只是构成了不同的记忆框架。因此,为防止中华儿女滑向民族分裂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轨道,陷入多重记忆框架的纠缠,更需要擦亮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框架,以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创的文明成果增强记忆框架的民族性“浓度”。

第二,增强记忆框架的稳定性。集体记忆框架的稳定性有赖于框定一个主体核心,即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集体记忆框架需要一个轴心力量的牵引和保障,以维持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稳定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价值引导和文化信仰,能够引起民族内部的情感融合和群聚效应,形塑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与认同,确保集体记忆框架的内部要素共同趋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稳定记忆框架的主线,既是确保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持久牢固的前提,更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记忆框架的重要途径。

第三,增强记忆框架的时代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各民族之间日益深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展现出新气韵和新形态,势必需要创新记忆框架以承载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借助新的符号、新的话语、新的目标推进框架内容的更新完善。如费孝通先生曾以“百花争艳的大园圃”<sup>[40]</sup>化喻中华民族,在此背景下各民族之间情感更加凝聚、意识更加统一,不断走向一体性格局形态。当下我们又创造性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精神家园”等概念,将中华儿女共同记忆、集体想象的场域牵引至“大家庭”,给记忆框架赋予新的“家庭”意蕴,引导中华民族成员找到自身的“家庭定位”,增强身份归属感,助推“中华民族一家亲”逐步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在推进记忆框架更新的同时,还要注重保持记忆框架的完整性。记忆框架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记忆特征、文化习惯多元多样,更新速度有快有慢。因此,完成记忆框架的革旧出新,需要充分考量各民族成员的独特性,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兼顾记忆框架的时代性和完整性,在新的记忆框架中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彰显不断凝聚的活力与特色。

(二)规正记忆方向:在扭正偏差中强化民族认同感

集体记忆的方向决定了整个集体的价值取

向和行为方式。但由于当代人的思想不会对过往中的全部记忆感兴趣,甚至会遗忘共同的情感经历,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无法产生深刻融通和情感共鸣时,就为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异化集体记忆的空隙和可能,会导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背离的错误思潮不断出现,企图切断各民族的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情感。同时,记忆主体在碎片化空间中产生的“混乱记忆”,也会影响中华民族集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因此,实现集体记忆的续写,必须重视对“偏差记忆”“混乱记忆”的扭正,规范引导集体记忆的方向,整治“失忆症”的同时,强化集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感。

第一,批判错误思潮中的“偏差记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也时刻面对着散布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冲击。各种思潮各有侧重而又彼此呼应,其本身的迷惑性与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交互叠加,使其影响力和破坏力增强,共同表现就是瓦解中华民族坚定的文化自信,抹除共同的历史认同,颠覆中华民族对历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集体认知,企图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制造混乱,扰乱和消解中华民族的集体性和凝聚性。对此,要积极引导中华儿女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并增强文化自信,通过建立完整有效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和中华民族当代故事的宣传矩阵,以全面、客观的视野去追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阵痛时期”和“辉煌时刻”。在阵痛记忆中唤醒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情感,在前景想象中激发中华民族成员的奋进力量和民族自信心,以历史铁证戳穿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和面纱,使中华儿女在各种错误思潮面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主动置身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与坚守。

第二,规整碎片化空间中的“混乱记忆”。记忆空间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记忆主体的缺场。由于互联网信息充盈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隔断了记忆主体与现实空间的联系与

在场性,使原本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亲历者”变为了“旁观者”,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情感联络被网络空间所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是记忆信息的散乱。蕴含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素材散落在中华大地各处,诸多要素未能形成协同联动,难以发挥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集成效应。对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整合碎片化空间的“混乱记忆”,既要打磨、拣选现存的集体记忆,又要按照记忆内容的特征进行分类整理。从共时性维度上,可以将集体记忆划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红色记忆、始祖记忆、人物记忆等类型,并与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源载体实现协同联动,促使人们走进系统化集成的集体记忆,从更全面、更深层的角度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部面相。如民族文化宫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将全国少数民族的敬献礼品展、党的百年民族工作文献档案展、文物精品展等囊括其中,引导人们感悟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党解决民族工作的艰辛与努力、中华民族的民族瑰宝,沉浸式体验和唤醒这些记忆的同时,加深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历时性维度上,可以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四个历史分期<sup>[41]</sup>进行集体记忆的分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依据不同主题划分成阶段性记忆,如新时代以来的脱贫攻坚记忆、伟大抗疫记忆、“探火”“奔月”“逐日”的航天记忆、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辉煌记忆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经历、共同创造的集体记忆。运用清晰的历史链条将上述记忆进行串联、整合,打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谱系,在呈现中华民族伟大荣光的同时,增强民众对中华民族历史成就的参与感、荣誉感,进而形成不断趋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丰富记忆载体:在情境濡染中激发心灵共鸣感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会自动转变为各族

人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完成集体记忆的续写,需要借助一定的记忆载体予以再现和保持,并在集体成员之间获得系统性、周期性的强化、普及和传承,促使各族人民在情境濡染中激发心灵共鸣感,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第一,打造承载民族文化的符号载体。打造符号载体是塑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在场感”的重要方式,其作用就是“用某种在场的感知来表达某种不在场的意义”。<sup>[42]</sup>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要形成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用以承载民族情感和集体记忆,这些符号逐步演化为确证民族存在、见证民族发展的有力证据,使民族群体更有记忆可寻、历史可循,最终走向凝聚统一。这些符号是拥有和再生产民族认同之象征的图式和符码,将其运用于追溯民族集体记忆,能够强化人们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确认和对民族历史的认同。因此,打造符号载体,有助于完成集体记忆的续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孕生心灵共鸣之感的象征符号。特别是拣选和推广赋有民族情怀的符号,这些符号与中华儿女的心性养成、情感塑造具有密切联系。在拣选和推广文化符号的过程中,要深挖其蕴含的育化意义,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锡伯族西迁等民族互动符号,黄河、长江、大运河、泰山、珠峰等自然地理符号,故宫、长城、布达拉宫等人文建筑符号等,这些文化符号的不断呈现能够强化各民族的共同情感,促生各民族之间的一体性意识。以“长城”为例,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标识,长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并经由多重叙事获得保持和强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符号。最初,修建长城的目的是抵御外敌,除军事价值之外,长城还具有维系民族情感和认同的意蕴,促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不断被强调和渲染,长城成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象征。进入新时代,长城符号更具多重叙事的传播特征,如运用“血

肉长城”“钢铁长城”<sup>[43]</sup>的话语来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助《望长城》《天下雄关》《长城大决战》《烽火长城线》《长城:中国的故事》等影视作品,围绕长城而建构的文化范式,再现这一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之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具有广泛性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文化模式。

第二,操演赋有民族情怀的仪式载体。传递和维持集体记忆的必要途径之一就是“纪念仪式”。<sup>[44]</sup>纪念仪式是集体成员依赖某种媒介,传递和强化价值观念的纪念性活动,也可视为更具程序化和重复性的形式化艺术,在续写集体记忆、陶冶民族情操方面具有独特的载体优势。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sup>[45]</sup>仪式操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进路,需要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之中挖掘仪式活动的重要资源,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圣人先贤、世系始祖、民族英雄、历史遗址、重大事件、重要节日等都是可以提炼出民族苦难、民族精神、民族辉煌和民族复兴记忆的纪念资源。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应发挥纪念仪式唤醒集体记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将强烈的民族情感融入操演者和在场者的当下体验。如近年来开展的孔子诞辰纪念、马克思诞辰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周年纪念、建党建军周年纪念、国家公祭日,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主题纪念活动,通过仪式操演和心灵体验,再现集体记忆的同时,映射出中华儿女记忆中崇尚英雄、保家卫国、民族团结的情感共鸣,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周期性的仪式操演中得到强化和巩固。

第三,赋能展现民族形象的数字载体。网络空间既是展现和贮存集体记忆的新场域,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高地。习近平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sup>[46]</sup>数字载体借助对传统媒介和单一传播模式的超越优势,在“视听说”等维度实现了对中华民族集体生活的

技术变革,不断以数字模型对集体记忆进行强力建构和表达,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性格进行影像化呈现,使得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实现“跨屏遍在”,有助于各民族成员在网络空间中完成集体记忆的相互连接和彼此确认。以数字化记忆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建构传媒矩阵,将中华民族共同的过往经历与未来想象转化为线上素材并填充其中,引导各民族成员在全景式体悟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光明前景的憧憬与自信。如《同心共筑中国梦》《国家记忆》《摆脱贫困》《大道之源》等主题纪录片,在各大主流网络平台同步播出,采用情境再造与情感联动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再度刻写、唤醒,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记忆共同体。同时,互联网是“偏差记忆”生成、隐匿和散布的重阵,对此要借助主流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引导,定期发布关于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发展成就、民族政策解读、民族交流互动等相关主题的宣传内容,增进各族人民对当前民族工作的清晰了解,以及对政策制度优越性的广泛认同,以此唤醒全体中华儿女的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认同感,如“道中华”微信公众号就是国家民委顺应世界百年变局,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展示中华民族国际形象的网络传播品牌。

## 五、结 语

整合集体记忆是塑造和维护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方式。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贮存了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过往和当下经历,并对各民族走向一体性格局发挥着聚合牵引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行整合和借力,而集体记忆的整合具有清晰的脉络:一是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在的“记忆之场”、互嵌的文明意义、共塑的民族精神,体现了对集体记忆整合之“前”的可能与条件;二是沿着“从后思索”的两条进路,追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体现了对集体

记忆整合之“中”的刻写和巩固;三是借力集体记忆,以筑牢记忆框架、规正记忆方向、丰富记忆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对集体记忆整合之“后”的续写和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我们站在国家民族的历史高度,从民族叙事的视角重新整合集体记忆提供了历史契机。我们应该根据现实需要对集体记忆进行选择、再现和重塑,整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形塑具有超强凝聚力和内在连续性的集体记忆,从而在历史中获得继续前行的文化力量。

###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9日。

[3]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杨须爱:《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郝亚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话语趋向》,《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等等。

[4]王延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麻国庆:《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彭继裕、王超:《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向度》,《广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

[5]“整合”,即将零碎化的、片段式的要素融合成一个整体,也称为“整合行为”,指涉一个群体成员为达到共同的目的而组成整体的能力。许多民族国家都面临“国家整合”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中分离而不相属的部分纳入单一疆域的主权国家,统一成为相互具有密切关系的整体,并建立国家认同,以避免国家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其铸牢的目的就是实现整合、走向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整合集体记忆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整合集体记忆就是将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集体信仰、集体历史等集体性“记忆”整合、凝聚和再现,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全新的认知结构,提升中华民族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未采用“修复”“恢复”等词,原因在于其内涵带有“断裂”“毁坏”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集体记忆的连续性和承继性。正如施瓦茨在研究林肯及其他美国英雄人物的记忆时所强调的,记忆必须被看作“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恢复的过程”。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6]社会成员的集体思想达到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就能够

通过回忆将人们聚合于共同体之中,例如庆典仪式、纪念节日、感人场景、重大集会等。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7][8][9][14][15][16][23][28][35][3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59、40、69、68、69、167、60、103、305、70页。

[10][美]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11][18][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32页。

[1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26页。

[13]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17]一是面对共同的外部敌人之时,一是内部矛盾得到正确认识和解决,并共同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之时。参见张淑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话语、成就与经验》,《民族学刊》2021年第11期。

[19][40]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6、46页。

[20]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21]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学术界》2020年第1期。

[22][24][3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25]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6]历史基因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见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学术界》2020年第1期。

[27]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8页。

[29]参见张淑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布及其当代启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0][4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6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33]“从后思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社会发展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然而,历史已经过去,在历史认识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或者无法清晰地了解事物的早期形式。而采取“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反过来思索,从现在到过去,逆向溯源,有助于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综合理解。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成熟样态,我们去探寻其成因或强化这一高级阶段,需要往前追溯和反思,既发现中华民族走向凝聚统一的历史规律,也借助这一历史成因实现集体记忆的整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36]任何文献神话的搜集与整理都无一例外地源于口传神话,这也是神话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参见王宪昭:《口传神话研究应关注的几个维度》,《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4期。

[37]参见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105页。

[38]《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人民日报》2022年7月16日。

[4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4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45]《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01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